

尽人皆知，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，却并非每一个人都清楚。1914年，清华建校刚三年，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《君子》，强调的是做人。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，之后才是做才子。

杨绛先生曾讲过：“我这里要提一提清华的校训：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’。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好像对校训并没有很在意。现在我越老，越觉得母校的校训意义深长。”

清华经历了113年发展历程，那场影响清华精神的《君子》演讲也已过去110周年了。时任校党委书记贺美英老师在199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讲话特别提到校

训：“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曾经哺育你们成长的清华园这片热土，让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’的清华校训和‘严谨、勤奋、求实、创新’的清华学风永远伴随你们去拼搏人生。”

梁启超先生在《无负今日》中写道：“今日者，涤荡昨日之旧我，建设明日之新我，唯笃行，唯耕耘，唯进步也。”

我们追忆梁启超先生《君子》演讲110周年，溯源清华校训的目的，就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传承清华人文精神，会同广大校友从中汲取营养、提升智慧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良的文化素养。

我的一九七九

○王乘东（1978级无线电）

1977年的冬天，中断了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，但此时的1977届高中生已经毕业离校，因此在时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中，1978级成为了“文革”后首次有应届毕业生参加的高考。而1977年的高考，全国各地的高考政策与试题各不相同，大部分地区允许1978级在校高中生参加1977级高考，所以全国数量众多的1978级高中生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参加过两次高考的高中毕业生。

我有幸在1978年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，并被推荐公费留学，但是阴差阳错，我最后加入了1979级大家庭继续学习五年，在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毕业。

1979年初，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，高教部开始从1978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员并派往西方发达国家学习。但一

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杨振宁则对邓小平建议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太小，世界观尚未形成，还是应该派研究生出国学习。从后来的实际结果来看，杨先生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，但此时，与新西兰、欧洲和日本教育机构的派遣协议已经签订，只能执行了，而北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派遣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进行。

被派留学生名单在高考成绩出来后，就已经由高教部确定，可此时的对外联系签约尚未全部完成，被挑选的这些学生都先按照第一志愿暂时进入国内高校学习，只是本人并不知情。开学两个月后，出国通知开始陆续下达，接到全国的第一份出国通知的，是前往新西兰的15名学生，几乎全部来自北大、清华，但在应新西兰方面要求进行的英语考试中，全体15人都未

达标，最后录取了成绩相对较好的6人，5名来自北大、一名来自清华。清华大学无81班的女生陈红，也成为了“文革”后清华学生派出留学的第一人。其实当年的清华领导并不十分支持派学生出国，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，所以清华的派出学生数量远远少于相邻的北大。

前期派出的留学生，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国内集训后就出国了，但两个重量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却已有所不同，这就是德国和日本。前往德国和日本的留学生收到通知最晚，且必须分别在同济大学和吉林师大进行一年的培训。在这一年当中，由对方国家派来教师教授语言及其所在国的中学课程，然后参加对方国家的大学入学考试。想必新西兰入学考试时，国内15名优秀学生的全体不达标震动了教育部高层，也才发现十年浩劫之后的国内基础教育是如此薄弱，因此对重头戏的德国、日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组织和安排。而且留德、留日学生连续派出了三年，持续时间

也是最长的。

在国内一流高校1978级的第一、二学期，不断有同学收到的出国通知犹如微风吹皱一池春水，搅得许多学生无法安心读书。我在第二学期中期，收到了前往德国学习的通知，与其他五名清华同学（其中三人与我同为无线电系）一起乘火车前往上海同济大学报到（还有第七名清华学生独自抵达上海）。

与此同时，德国的歌德学院也派遣了七名教师来到上海，想必他们与我们一样，都对对方的国家和人民充满了好奇，并将这种好奇极大地转化为求知和努力学习的动力。

当我们这群100名留德预备生前往同济大学集中时，是按照到达的顺序安排宿舍的，我们的宿舍是一栋孤零零处在荒草丛中的黄颜色五层楼，叫做西南二楼。我们清华的六人进到宿舍房间时，里面已经有三名复旦的同学了。一间宿舍八人，清华电力系的张农就主动到了其他宿舍。

我选择了一个上铺的床位，而对面靠窗的下铺，是一位从复旦来的面容清秀的瘦男孩，他叫张首晟。因为不在同一个班级，所以我与张首晟的交流基本都是在宿舍当中。首晟后来成为全球顶级科学家，并于2009年作为客座教授加入清华大学，每年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用于培养清华的人才，全方位参与学校发展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大学校园也与全国一样，百废待兴。我们上课时的小楼叫做安装楼，应该是同济校园内最新的一栋建筑了。而我们住的西南二楼，则老旧而破败。记得我们清华六人坐了一夜火车进到西南二楼时，



八位舍友合影，前排左起：李跃（清华无线电）、杨建灵（复旦）、张达（复旦）、张首晟（复旦），后排左起：卢文岩（清华精仪）、刘伟麟（清华无线电）、李鹏曦（在校名李晓鹏，清华无线电）、王乘东（清华无线电）

我首先到盥洗室想漱漱口，但水刚进嘴里我就赶快吐掉了，我不是误用了化学实验室的什么试剂水吧？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的。此时一个楼里的同学端着洗脸盆进来，我向他确认了这的确是学生宿舍的盥洗室，当年上海的水质就是如此。

在宿舍里，张首晟向我展示了上海人精致的一面。“文革”刚结束时的物质供应还不是那么丰富，但上海高校食堂的伙食比北方高校还是要强许多，同济大学食堂里的四喜肉让我们许多同学至今记忆深刻。但对于我们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，食堂的一日三餐似乎还不足以保证每日身体与大脑的消耗。对刚刚16岁，且正在长身体的首晟来说，想必更是如此。因此首晟自己备有一个饼干盒，每天晚自习后，他会从饼干盒中拿出几片苏打饼干，然后抹上一层白里透黄的东西，慢慢送入嘴中细细品味。每次只吃两三片，绝不多吃。虽说首晟还只是个少年，但已看出极有自制力。

我躺在上铺的床上好奇地看着他日复一日地吃夜宵，终于有一天问他，抹的那是什么？首晟告诉我，是Butter，中文叫白脱。我顿时感觉大开眼界，这东北京买都没地方买，好小资啊！“小资”在“文革”中是个被批判的概念，但与知识分子的“臭老九”一样，人们嘴上批判，可心里却羡慕。后来在德语课上也学到了Butter，发音却是“不特”，我很庆幸自己这时已经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宿舍已经人手一个饼干盒了，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并会付诸行动，但我始终没在宿舍抹过白脱。

我们这100名留德预备生是1979年3月中旬到上海同济大学集中的，而歌德学院

的老师是3月底抵达上海，经过必要和紧张的准备工作中，4月6日开始上课。在中间这空余的时间里，留德预备部除安排一些青年德语教师教我们德语字母外，没有太多的活动内容。当歌德学院的德国老师们到达学校时，那些在“文革”后期才完成学业的同济年轻德语教师，也终于有了德语“实战”的机会，还不会德语的我们，能看出他们当时的兴奋和因为真的可以与老外沟通而产生的满足。

经过十年“文革”的教育荒废和文化沙漠后，我们这批年轻人有着争分夺秒抢回被耽误时间的紧迫感，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饥饿感和希望能对国家及社会作出贡献的使命感。那时的学习气氛非常的浓烈，学习态度自觉、勤奋。每个同学都不会浪费分秒的时间，大家都会利用这段没有被安排的时间自觉地学习各种可能的知识。

我父母都是从事数学工作的，父亲更是在大学教数学课程，从小对家中书架的印象就是摆满了各种大小、薄厚、新旧不一的数学书籍，有些看上去甚至如同古籍善本。离开家去上海前，我随手从书架上拿走了一本薄薄的蓝色数学小册子《集合论》，之所以拿这本书，就是因为它薄，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看完。这本书此时正好成为了我的课外读物。

可有一天，首晟坐在床边笑眯眯地轻声对上铺的我说道：“你怎么总是在看《集合》？”嗯？有意思的问题！集合的确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数学科目，本身又不像一些高深的数理问题那么有价值。首晟提这个问题说明他了解其内容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屑。

从我们的日常交流中，我能感受到首

晟鲜明的兴趣取向。我是个从小就有强烈好奇心和喜欢动手的人，虽然没有像某些会成为发明家的男孩一样，把家里的钟表和收音机都拆掉，但无线电的确曾是我的热爱。上中学时，在抗震棚中用绕线机绕制变压器曾经是我的业余活动。也在1976年制作完成了家里的第一部电子管电视机，虽然那部黑白电视只能收一个中央电视台，电视天线与房间等长，而且看电视的过程需要我在一旁保驾护航。在像我一样的这类人里，认为男人天生就应该是个机械狂！但首晟对机械和设备一丁点兴趣都没有，反倒是常常不经意地向我流露出，学工程多没意思啊！首晟的兴趣完全是沉浸在数学、物理公式推导过程的无穷幻化之中，就如他成名之后所说的，尽情体验数理公式所展现的逻辑之美。

从首晟那里，我也的确体验过数理之美。我们当年高考的数学内容包含了代数、平面几何、二维解析几何、三角函数和高等数学初步几项内容。平面几何曾经是我的绝对强项，当年许多大院里的孩子高考复习时找我父亲辅导，其中平面几何题目基本都是我解的。在我们正式上德语课前的空窗期的自学过程中，我有次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找首晟讨论。他只看了一眼，就迅速把解题思路告诉了我。这是一道需同时用到三角函数和三维解析几何的题目，一个锐角，需要在三维空间中做 360° 的旋转。哇，太魔幻了，思路对了之后，解题如此简单！如今已经过去了40多年，我早已不记得那道数学题的具体内容，但那虚拟空间中的美妙旋转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之中。人类作为智慧生命，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，就是因为人类具有了想象力。40多年前在同济大学的



留德预备部同学集中开会，第3排左3为王乘东、第4排左2为张首晟

宿舍里，首晟已经向我表现出了他所具有的这种能力。

德语教学开始了，这也是我们那群年轻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，学习他们的语言、了解他们的文化、熟悉他们的历史、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。首晟与我不在同一个班上，我们倒是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班级与老师的情况。都说学习语言越年轻越好，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后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基本会话。当然，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些差异，但首晟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出类拔萃。他会经常说出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生僻的德语单词，有时还会引经据典地讲出词源。是因为他更加年轻？更加充满激情？还是更加聪慧？可能都是。

首晟与大多数少年一样，贪睡是必然的。他很少早起，但一定早睡，也从不参与同宿舍同学熄灯后的聊天对话。他后来对别人说，他在睡觉前会闭着眼睛听着从其他同学口中说出的德语单词，让其在自己的脑中回旋并联想，直至入睡。

经过“文革”十年的闭关锁国，所有中国人都渴望着与外界交流，出国则是当时最大的时髦和荣耀，而到国外留学，对

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几乎就是做梦。但少年首晟此时则显示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老成持重。当留学风刚开始在一些高校中吹起时，首晟对家里人说，如果让他去留学，他只会去美国、英国、德国这三个国家，其他国家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。苍天有眼，最终让他如愿以偿。

同年八月底，德国的DAAD（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）又派来了一批教师，按照德国大学的入学要求，给我们补习数理化和生物课程。而同济留德预备部则开始为我们这100名留德预备生“分配专业”。我们原本在各自的学校都有自己的专业，作为中学时代的“电子科技迷”，我高考后如愿进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，但留德预备部此时则是按照国家需要重新安排专业。首晟继续了他在复旦时的物理专业，而我则被分配去德国学习农业，这对我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，我也因此在同济的后段学习时间内变得消沉。

在留德预备部的学习结束时，我们都

Feststellungsprüfung。由于学习生物、医学、农林专业在DAAD补习课程的内容与理工科不一样，所以资格考试的内容也不同，这意味着考试通过的我也无法再在德国换成理工科专业了。

考试之后是出国体检，包括我在内的3~4名同学被查出有肾结石。肾结石的成因有多方面因素，但我始终把当时的情况归结于那如化学试剂一般的水质。许多同学都当即采取了措施，因为那时还没有体外碎石的技术，所以都是手术完成取石。但我已经决定放弃了，我依然没有做好去德国学习农业的思想准备。

实际上，大学毕业后，我也并没有从事与电子和无线电相关的工作。如果在今

天，我也一定不会对专业方向如此地执着。但我是一个从不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的人，我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十分满意！

结业大会是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孔雀厅举行的，氛围比较轻松、自由和活跃。当留德预备生中年龄最小的首晟被指定代表全体留德预备生讲话时，我应该是站在最后面靠近出口的位置，脑子里想的，是我将与所有同学告别，与尚未见面的德国说再见，这权当是我人生轨迹中的一个偏差吧。

我与留德的同学们分道扬镳并回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加入1979级无91班继续学习。

现在几乎很少人知道“文革”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派高中生公费出国学习这件事了，我希望通过此文留下当年的记录。



1979级无91班毕业留念，最后一排右1为王乘东